

对奈格里“主体性”解读的反思与批评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

李雪阳

[摘要] 20世纪70年代末，奈格里完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机器论片段”的“主体性”解读，并撰成了《〈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通过对以“机器论片段”为中心的多个文本的考察，我们认为，奈格里的“主体性”解读无疑有助于抗衡“令人窒息”的“经济主义”“客观主义”阐释，且使马克思“思想”呈现出一种应然的理论“完整性”，但由于这一解读路径过于强调“分离逻辑”主导下的劳动者“主体性”，从而不仅弱化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辩证性，而且使他力图颠覆“剩余价值规律”的反抗方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机器论片段” 安东尼奥·奈格里 主体性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23)04-0276-10

1857年7月至1858年10月，马克思完成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它一共包括4个手稿，分别写在8个笔记本上，其中第3个手稿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由于第一次以德文发表时被编者加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标题，自此它就以《大纲》闻名于世。其中第6本笔记第43页到第7本笔记第5页内容为“机器论片段”。其对应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8—110页《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章节。^①20世纪60年代迄今，沉寂百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成为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重构马克思哲学的主导依据。在这一过程中，“机器论片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

作者简介：李雪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广州 510635

^①熊晓琳、孙希芳：《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几个争议的辨析》，《理论视野》2021年第6期，第18页。

用,甚至被他们誉为“圣经式的文本”。^①对于“机器论片段”,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盛赞它毫无疑问“是我们在《大纲》中,也可能是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运用矛盾而且建构辩证法的最高级例子”,并且“处于《大纲》中马克思理论张力的最高点”。^②

一、“机器论片段”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大纲》“机器论片段”中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给予了高度关注。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马克思不仅指出作为劳动资料的“自动的机器体系”成为“固定资本”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种必然性趋势,而且更积极展望了“作为生产统治形式”的资本之“自我解体”的可能性前景。据此而言,“机器论片段”的基本内容可被分为两个内在关联的部分:一、提出“机器是固定资本最适当形式”观点并论述其“双重依据”;二、对“作为生产统治形式”的资本之“自我解体”做出阐释。

(一)“机器是固定资本最适当形式”的观点及其“双重依据”

在马克思看来,“‘自动的机器体系’实为‘固定资本’最适当形式”这一观点具有“双重依据”:首先,在资本逻辑之下,“自动的机器体系”指向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努力同“原初”诉求(减轻劳动者辛劳)虽渐行渐远,却完全符合资本“否定必要劳动、增加剩余价值”的根本诉求;其次,“自动的机器体系”令劳动者的自主性、独特性及反抗性丧失殆尽之余,日渐沦为生产机器“有意识的肢体”。

1.第一重依据——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否定必要劳动、增加剩余价值”

毋庸置疑,人类制造劳动工具或创造生产机器的最初诉求无非是为了减轻劳动者的辛劳程度。依据这一普遍流行的观点,人们一度展望甚或焦虑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前景:随着科技进步及由此推动的“自动的机器体系”持续升级迭代,社会工作时间将大为减少,人们不得不需要应对“过多的自由时间和闲暇时光的威胁”。^③不过,马克思却一再提请人们注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表达过的质疑(即“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是值得不断审视和持续反思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采用“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根本诉求,如同“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总之,“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④正因如此,工人应当“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⑤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机器。自然力与科学的应用》一文中就已充分阐明,即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采用“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最终目的,决非为了减轻劳动者的辛劳程度,恰恰相反,“自动的机器体系”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却是变得愈发深重。

2.第二重依据——压制和削弱“劳动”

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指出,当出现“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概念区分后,“劳

①孙乐强:《超越“机器论片断”:〈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审视》,《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第5页。

②[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③[日]森冈孝二:《过劳时代》,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30—3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93页。

动材料”“劳动产品”及“劳动资料”之间的差异将不仅只是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的“量的关系”，而且更表现为一种资本形式规定上资本本身的“质的差别”。此时此刻，“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归属为“流动资本”范畴，而“劳动资料”则归属为“固定资本”范畴。正是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概念的区别出发，“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主要地成为了资本本身在各阶段上的使用价值；“劳动资料”则主要地表现为由资本总过程决定的特殊资本存在方式——固定资本。这意味着：在资本宰制下，生产过程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劳动材料”“劳动产品”和“劳动资料”纷纷脱离劳动范畴，“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并开始与劳动相对立。

当“劳动资料”在经历了不同形态而最终止步于“最后的形态”——“自动的机器体系”时，上述情形不仅变得愈发突显和典型，而且工人的劳动亦发生了某种根本性转变。首先，不同于“前机器时代”“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①“自动的机器体系”并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即机器决不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对劳动者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起中介作用，恰恰相反，“自动的机器体系”通过广泛而深度地应用科学规律（如力学、化学规律）和技术手段拥有了日趋显著的“机器自主性”（如同马克思所说的“生成了自身的灵魂”），并通过“机器生产分工”逐渐瓦解了工人劳动的整全性。于是，“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②在整个机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沦为“自动的机器体系”“有意识的肢体”，“活劳动”亦被“对象化劳动”占有并转变为生产机器“单纯的活的附件”。自此，劳动者“主体性”渐趋被庞大复杂的“自动的机器体系”所吞噬。其次，瓦解工人劳动整全性的“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分工”，不仅使劳动者同最终产品之间的联系不再像以往那样一目了然，而且加剧了工人具体劳动的“简化”和“同质化”演变趋势，从而导致在企业 and 工厂中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去技能化”现象，即“如果你能操作这台机器，你也能操作那台机器”。^③对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伴随机器大生产的突飞猛进，未来工人的劳动或许仅仅只是对机器运转、对机器作用于原材料起中介作用，即看管好机器以防止其发生故障而无法进行生产。复次，如同马克思所言，增长了劳动生产力，既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又表现为劳动自身力量的削弱。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工人具体劳动的“简化”“同质化”和“去技能化”不仅使得劳动者“主体性”、工人劳动“整全性”“独特性”日趋衰微，而且更使得劳动者的“脆弱性”“顺从性”在专横跋扈的资本面前陡然上升：一方面，资本可以随时用“非熟练工”或更易受支配的劳动者（如女工、童工）替换掉熟练工；另一方面，就其天性而言，女工、童工的“脆弱性”“顺从性”要远大于成年男性劳动者。

（二）展望“作为生产统治形式”的资本之“自我解体”可能性前景

数个世纪以来，资本一直致力于利用科技、占有科技并赋予科技这样一种使命：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针对这一客观历史进程，马克思着重提及了其另一重面相：科技在生产过程中广泛而集中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智识同单个工人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正像生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1页。

^③ [美] 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①由此一来,工人慢慢变成企业和工厂躯体中“没有头脑”的“有意识的肢体”,而资本却逐渐升格为吸纳科学理论和技术知识且控制一切、指挥一切的“中枢”和“头脑”。由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立,于劳动者及劳动过程而言,科技在臣服于资本时已演变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统治权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却深刻揭示出已然臣服于资本的科技对劳动者的“非异己性”“非敌对性”,以及对上述现实状况切实产生的某种根本性扭转,而当这一根本性扭转真正出现时,“作为生产统治形式”的资本之“自我解体”的帷幕亦将徐徐开启。在马克思看来,在作为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是以直接劳动时间的量或耗费的劳动量作为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即马克思所说的“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②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及其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越来越广泛而深度的应用,社会的财富生产势必会越来越地决定于直接劳动时间的量或耗费的劳动量,转而更多地决定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于是,资本在不知不觉中违背了自身的初衷和意志,“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最终,“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③此时,社会便演进到了不再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而是以可自由支配时间作为衡量财富尺度的崭新历史时期。

二、奈格里对“机器论片段”做出的“主体性”解读——基于《〈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一) 奈格里对《大纲》的总体性理解

奈格里对《大纲》的总体性理解是在对历史上曾经涌现的众多有关《大纲》的观点的反思和批评中逐渐得以呈现及廓清的。首先,奈格里反对在那种看似严谨的文献学考究方式下(即从马克思信件中“逐字逐句摘取”)所得出的关于《大纲》根本性质的推断。他指出,所谓的文献学考究方式仅仅依凭某些文献段落中的只言片语(如“《大纲》是在充满力量的灵感的狂热中写作的”“《大纲》是在对极端孤立的绝望中写作的”等),就武断地将《大纲》从马克思经典化、体系化理论范式中剥离及剔除,就此而言,这一考究方式及其得出的结论尽显鲁莽性、随意性和仓促性,不足以取信。其次,奈格里不仅强烈反对那种将马克思“思想”明确指认为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断裂”的观点,而且同样强烈反对在这样一种所谓“断裂论”影响下将《大纲》视为“青年马克思”最后一本著作的看法。奈格里说,上述观点虽然将《大纲》描述为“令人敬畏的创造性的成果”,但却始终坚持认为《大纲》“只不过是重复马克思早年的人道主义中已经提出的观点”,因而,其“只是一个散发着唯心主义和个体主义伦理臭味的草稿”,特别是“机器论片段”中“对共产主义定义的描绘只是18世纪客观唯心主义和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姿态的综合”。^④此外,奈格里还旗帜鲜明地反对以罗斯多罗夫斯基为代表的将《大纲》视为通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3—105页。

④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34页。

《资本论》一个阶段（或环节）的见解。奈格里指出，《大纲》并非一个专门被用来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资本论》的构思的文本，“它同时是一个政治性文本，与革命可能性的高涨相配合”。^①罗斯多罗尔斯基的错误在于他采用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方法，即不是依据《大纲》本身来解读《大纲》，而是试图将其归结为某种不属于它自身的东西，试图将其归结为思想史漫长发展历程一个连续性上的自然质点，从而丧失了必要的“跳跃”“断裂”“视野的多样性”及“实践的紧迫性”。

在奈格里看来，尽管“手稿”这样一种特殊的书写形式（特别是其中容易使人产生混淆解读的零散论述）令《大纲》成为了一部艰涩难懂的文献，但这却难掩其在马克思“思想史”的“核心”地位及其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奈格里指出，《大纲》“表示这个体系正在形成过程中，而且它向实践的总体性保持开放的姿态而非封闭的姿态”，所以，其实为“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②一方面，《大纲》中包含了许多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论证；另一方面，《大纲》既是一本经典性（genetico）著作，也是一本展望性（prospettico）著作。正因如此，倘若从与《资本论》比较的视角来看，《大纲》不仅一点儿不逊色，而且应当是超越了甚至是引领着《资本论》，“如果我们根据《大纲》的批判来理解《资本论》，如果我们通过《大纲》的概念体系重新阅读《资本论》，……我们就能重新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不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勤勉治学，而是为了群众的革命意识）”。^③奈格里从“外部事件”角度对《大纲》何以能占据马克思“思想史”的“核心”地位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西方世界爆发的一场经济危机，即作为“马克思思想中首次伟大的政治性整合”的《大纲》的诞生源于一个“极端危机”事件——1857年西方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于是，危机激活了主体性，令《大纲》成为一个内涵鲜明而丰沛“革命主体性”意蕴的重要文本。事实上，在奈格里那里，马克思“思想”内涵的“主体性”相较于“客观性”而言始终占据着“主导”或“统领”地位。因此，奈格里认为，突出强调《大纲》“革命主体性”维度，一方面，必将有力扭转或改观以往将马克思“思想”做出过多“经济主义”或“客观主义”解读的不良倾向（此类倾向之所以是“不良”的，在于其压抑或窒息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性”或“能动性”维度）；另一方面，势必与对马克思“思想”倾向于做出“经济主义”或“客体主义”的解读一起，共同勾勒或构筑一个马克思“思想”的完整理论视域。

（二）奈格里对“机器论片段”的“主体性”解读

在对“机器论片段”进行正式解读前，奈格里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的“主体性”观点。首先，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生产方式始终内涵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主体，即资本（奉持“物价稳定逻辑”）和劳动（奉持“自我价值稳定逻辑”），“当两个自治的实体必须互相面对，并被迫联结在一起，一个包含着特殊计量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④资本的“主体性”表现为自我增殖和自我扩张的力量，以及对劳动的严密控制、绝对支配及严酷剥削。劳动的“主体性”既表现为劳动实为价值的创造者或“独一无二”的财富“源泉”，也表现为工人阶级在面对资本压制自身时对资本发起的持续不断的反抗和斗争。恰恰正是这些斗争，在造成资本发

①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24页。

②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37—38页。

③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38页。

④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96—97页。

展之余更造成了阶级构成的增强、工人阶级需要和快乐的扩大及在再生产过程中必要劳动价值的提升。其次，奈格里指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一方面，揭示出工人阶级从资本宰制中发展工人自治的可能性，即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升，资本开始“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①另一方面，预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罗斯多罗斯基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灾难主义”是革命音乐的关键音符，^②马克思所展现的危机总是或隐或显闪现着共产主义微光。对此，奈格里坚持认为，任何一个无论是理论上的抑或是实践上的所谓“飞跃”，均无法离开一种“主体性”力量的实质性、能动性支撑与促推。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假若危机透露出未来的某种信息，那么，从危机“过渡”到未来的历史进程背后必定一直都有革命主体和阶级斗争的身影相伴随。

在集中研讨“机器论片段”的章节中，奈格里始终以“分离逻辑”（the logic of separation）为指导。他指出，“从工资到主体，从资本关系到阶级斗争”实为马克思“思想”的唯一主题，从这个意义而言，若没有得出“分离逻辑”主导整个过程的结论，甚至无法阅读《大纲》。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期，资本和劳动相互分离的态势不仅仍在继续，而且愈发凸显。由此一来，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矛盾甚至冲突无疑将会变得越来越尖锐而激烈，“从此以后，阶级斗争与政治便成为经济理论的核心。……这不再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而是一种敌对关系，尽管它总是受到控制，但却充满危险与反叛”。^③奈格里认为，资本和劳动两类主体间的对立和冲突首要地表现在资本利用吸收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的“自动的机器体系”对劳动所形成的空前压制和极大削弱。相较于往昔（如手工业时期），由于科技臣服于资本并在生产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劳动的自主性、独特性、趣味性、吸引力等均丧失殆尽，活劳动被牢牢嵌入充满活力的、持续运转的“自动的机器体系”生产过程中，使“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④更糟糕的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及由此产生的对必要劳动的否定是完全符合资本利益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⑤于是，或迟或早，劳动的“主体性”必将被科技和机器所共同构筑的现实压迫“暴力激活”并开始谋求同资本“主体性”相抗衡，“这种对抗必定在力量的最高水平上进行自我再生产”，“取代对抗性的辩证法必将全面展开而且在这个层面上充分运行”。^⑥

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深刻揭示出，伴随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日益广泛而深度地采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以直接劳动时间量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同财富生产日益更多地决定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势必越来越尖锐而激烈，最终，资本主义将在这一对矛盾的辩证运动中走向彻底解体，“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3页。

②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132页。

③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171—1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2—93页。

⑥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183页。

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①针对这一重要思想，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呈现出一种“双重面相”：第一重面相，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劳动力由剩余劳动指挥和控制，而且“价值理论”亦在显得抽象之余仅仅只是从资产阶级角度出发从而完全隶属于“剩余价值理论”；第二重面相，在无产者革命计划中，重新分配的剩余劳动由必要劳动来控制，从而使“价值理论”不再处于从属或次要地位，这个时候的“价值理论”形式高效且意义重大，其宣示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失效与终结，“当价值理论不能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或者一个个体的劳动量来衡量时，或当第一次更迭导致价值理论去面对社会时间还有集体劳动量时，此时，衡量剥削的不可能性就修正了剥削的形式”。^②由于奈格里始终坚信，从《大纲》以及马克思所有其他著作中能够找到的（唯一）解放之路，就是强调“分离逻辑”指导意义，以工人阶级“主体性”作为资本这一主体的对立面和潜藏财富来碾碎资本，因为工人阶级“主体性”一向立足于同剩余价值规律相对立的基础之上。因此，在解读“机器论片段”时，奈格里展现出了一条推动资本主义走向彻底崩溃的清晰的“主体性”之路：“不是要颠覆对资本主义的控制力，而是要扭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否定并重新分配剩余劳动”，“这条主体性路径处于资本关系之中，它不是在想象中去改变，但它知道怎样做，它不断加深分裂，以破坏这一关系”。^③进而，针对“颠覆剩余价值规律”这一最大诉求和最终目标，他提出了一个看似具有实践操作性的方案，即“不劳动”方案。在他看来，这一实践方案不仅将成为工人阶级的根本性主张，而且将“成为价值规律被颠覆的基础，也成为剩余价值规律被重新阐释的基础”。^④

三、反思与批评

毋庸讳言，奈格里对“机器论片段”所做出的“主体性”解读是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广泛兴起密切相关的。不同于西方其它左翼思潮和进步运动，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反对目标并非右翼势力，而是本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因为在自治主义者看来，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已经站到了工人对立面，成为了资本的帮凶。所以，要想真正实现工人解放，唯有依靠工人自身。这就决定了，他们既反对强调客观规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醉心于抽象思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转而主张构建一种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⑤正因此，不少学者指责以奈格里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已经偏离了政治经济学的纯粹学术语境而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明确的政治目的。^⑥不过，恰恰正是由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一向对现实有着深切的观照，能够与广大普遍（底层）劳动人民共情，自始至终希冀投身政治运动以解决工人阶级困窘不堪的生存境况并进而推动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事业，所以，他们的思想理论不仅充满着对“主体性”哲学的高度尊崇、始终洋溢着振奋昂扬的精神同饱满蓬勃的斗志，而且如同用“奥卡姆剃刀”裁剪过一般，简练明快，直抒胸臆，在直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页。

②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188页。

③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191页。

④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189页。

⑤ 孙乐强：《超越“机器论片断”：〈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审视》，《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第6页。

⑥ 唐璜：《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如何出场？——“机器论片断”的当代反思》，《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48页。

全球资本主义种种弊端之余，积极展望一种超越资本狭隘视野的可能性前景。就理论层面来说，奈格里对“机器论片段”做出的“主体性”解读，在彰扬劳动者“主体性”或革命者“主体性”、彰扬“主体性”永无止境的“悸动”，以及强调“分离逻辑”实为马克思“思想”内涵的重要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必将有助于抗衡和纠正那种对马克思“思想”做出“经济主义”“客观主义”阐释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有助于解构和去魅在“经济主义”和“客观主义”科学外衣之下为资本“永恒性”“合法性”做出论证的种种“迷思”（Myth），有助于质疑和挑战在资本“永恒性”“合法性”话语宰制下相较于“自我价值稳定逻辑”而言居于主导地位的“物价稳定逻辑”，从而恢复与展现马克思“思想”中一度被“科学的”“经济主义”和“客观主义”抽象思辨理论层层遮蔽包裹的“主体性”维度，恢复与展现马克思“思想”中始终如一的对作为主体的劳动者（或革命者）所拥有的“实践性”“能动性”“创造性”的积极肯定和高度尊崇，恢复与展现马克思“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张作为主体的劳动者（或革命者）对现实做出反思批判并开展革命活动的内在要求。关于这一点，奈格里曾说，“马克思被视为客观主义者和经济学者，并被解释成消解革命行为的思想家”，“我们不想否认，……人们仅仅透过客体主义的眼镜就能够阅读马克思的大量文本（特别是那些第二国际在德语世界编辑出版的文本）”，“另一方面，我们想要说的是，无论是进行客体主义的思索，还是频频将他的分析回归到经济上，都不可能使我们就马克思的思想给出一个整体的阐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彻底批评最近兴起的普通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灾难性的和令人慰藉的方方面面，批评它客体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观点，还有它惯常的经济学倾向”。^①另外，就实践层面来说，既然意大利自治主义思潮的涌现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自治主义政治运动存在密切关联，那么，毋庸置疑的是，一方面，奈格里对马克思“思想”做出的“主体性”解读势必能够为自治主义政治运动提供充分的学理依据和有效的思想指导；另一方面，奈格里对马克思“思想”做出的“主体性”解读势必能够提高促进工人劳动者参与自治主义政治运动的热情和积极性，扩大强化工人劳动者参与自治主义政治运动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推动提升自治主义政治运动深入人心的程度以及拓展延续自治主义政治运动自身的生命力。这一点表明，正是由于奈格里对马克思“思想”做出的“主体性”解读带有显见政治色彩且带有明确政治目的，反倒使其嵌入一个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并发挥出一定（该有的）社会—历史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诞生于“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历史初期，奈格里在这一著作中对作为主体的工人劳动者“实践性”“能动性”甚至“革命性”的肯定和颂扬，以及对超越资本主义前景积极而乐观的展望，恰似深沉暗夜中的一抹闪电、一声惊雷，不仅对“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具有反思性和颠覆性的挑战，而且更给予沉沦于资本全球化时空网络中的亿万劳动者以动力和希望。“主体性不仅解放其自身，它还解放诸多可能性的总体”，“它勾画出了一个新的视域”，“所有这些都指向作为资本关系对立面的社会个体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②

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条件下，劳动时间的节约相当于为劳动者增加了实现自身充分发展的自由时间，而劳动者个体的充分发展又会反过来作为最大的生产力作用于劳动过程。“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

①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176页。

②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191页。

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①客观地说，马克思这一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具有显而易见的“劳动主体性”意蕴。当然，需要澄清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主体性”并非一条独存的逻辑线索，其始终牢牢建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客观性规律性发展承认之上且与之形成了一个辩证共存的矛盾统一体。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内涵的矛盾，即资本以直接劳动时间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和财富生产越来越多地决定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两者之间矛盾的持续演进同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实践性”“能动性”“革命性”两个方面辩证且同向的历时性运动才逐渐将资本主义“总危机”摇曳身姿及超越这一“总危机”的某种模糊远景呈现出来。据此，奈格里的问题在于，由于他始终高度警惕马克思“思想”解释中存在的“经济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从而不知不觉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中“经济主义”和“客观主义”解释倾向的过度拒斥并在凸显马克思“思想”“主体性”维度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的情形是，在“机器论片段”中，奈格里对马克思“思想”展开的“主体性”解释，几乎避而不谈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超越资本异化统治、达至未来大同世界，似乎仅仅只有依循“分离逻辑”发挥“劳动主体性”这样一条路径。他总是强调，“资本的有机构成没有附加工人阶级的政治组成”。^②在他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任何强调、讨论和研究均有可能滑向对资本统治“永恒性”“合法性”或者“物价稳定逻辑”进行捍卫的错误方向。由此而来，奈格里因为反对一个错误的极端，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另一个同样错误的极端。

20世纪50年代以伦涅罗·潘齐埃里(Raniero Panzieri)为代表的“工人主义”(Operaismo或Workerism)，诉诸工人阶级“主体性”，强调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反对政党、工会等一切代表机构，强调工人相对于资本的优先性。依循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批判了让劳动变得有尊严的话语并提出相应对策：“停止工作——罢工是工人斗争的经典形式——意味着拒绝作为生产组织者的资本的命令。”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将‘用于生活的时间’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从而最大限度压缩工作时间。^③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为彰扬工人阶级“主体性”，力求全方位和彻底地颠覆“剩余价值规律”，奈格里提出了一个与特龙蒂“停止工作”非常类似的反抗资本的实践方案，即“不劳动”反抗方案。实际上，倘若从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术流派思想的统一性、内在理论逻辑的延贯性，以及斗争策略制定的相似性等诸多方面来看，奈格里所提出的“不劳动”反抗方案既不令人意外、亦不令人惊喜，恰恰相反，奈格里的这一方案反倒是会使人略感乏味、失望及困惑。首先，假设将奈格里的这一“不劳动”反抗方案置于《〈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文本语境中进行观察，一种或隐或显的“断裂感”即会呈现出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断裂感”，一方面是由于奈格里对《大纲》层层递进展开的文献学考察和逻辑缜密的深入研析同形式单一、内涵单薄及缺乏具体说明的“不劳动”反抗方案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8页。

②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163页。

③ 王行坤：《拒绝工作，寻求承认，还是走向后工作——国外左翼学者对劳动概念的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2期，第161页。

通篇逻辑性、系统性强的学理分析同简略而直白的“不劳动”反抗方案之间难以形成具有层次性、对应性、互证性的良好衔接。其次，奈格里的“不劳动”反抗方案之所以是形式单一、内涵单薄及缺乏具体说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一简略而直白（甚至是“粗陋”）的反抗方案，令人惊愕地缺失了对“具体境遇”的充分顾念和考量，其在略显教条之余，俨然幻化成康德式的“绝对律令”，于是，“不劳动”反抗方案只是高居于“理念王国”对“粗糙的尘世”发号施令，却罔顾现实世界中身处万千差异性“具体境遇”中的亿万普通（底层）劳动者并放弃了对他（她）们不得不直面的种种现实遭遇及艰难困苦的甄别与审视。此外，奈格里的“不劳动”反抗方案抛弃了辩证思维方式，其仅仅只是偏执地聚焦于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却忽视了同样作为主体的资本一方，“见己不见彼”令这一方案丧失了适度的预见性、从容的灵活性及必要的主动性，换言之，这一反抗方案的主要缺陷之一，乃是令人震惊地严重忽视或大大低估了数个世纪以来资本在应对各类危机和劳动反抗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智识与能力，严重忽视或大大低估了数个世纪以来资本为维系自身统治和“物价稳定逻辑”积极探索及大胆尝试的自我调适的意志与力量。

四、结 语

毋庸置疑，奈格里对《大纲》特别是“机器论片段”展开的“主体性”解读的确有不少值得肯定和令人赞赏的地方。从理论层面而言，这一解读路径不仅有助于恢复及凸显马克思“思想”中一度被“淡化”“边缘化”的“主体性”维度，从而使马克思“思想”呈现出一种应然的“完整性”，而且有助于警惕和防控“令人窒息”的“经济主义”“客观主义”解读沦为资本“永恒性”“合法性”辩护者及“消解革命行为者”的风险，从而推动马克思“思想”解读朝着更为积极、更为能动的方向转变。从实践层面而言，由于这一解读路径在资本与劳动的辩证统一体中特别强调“劳动”而非“资本”（包括强调“劳动”对“资本”的超越性），其势必有助于全球劳动者恢复或提升“主体性”自觉，增强反抗资本逻辑的意志、勇气和能力并赋予全球受剥削压迫民族和底层民众一种积极展望超越资本宰制未来愿景的乐观主义，这一点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日益深化的当下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与此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奈格里的“主体性”解读的确存在着诸多值得商榷及亟待深究之处。对于奈格里“主体性”解读中存在的种种错误和偏激之处须辩证对待：一方面，要持续不断地讨论辨析及纠正改善；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这些所谓的错误和偏激之处根本源于奈格里和其他自治主义者共同分享的概念体系和观念理论、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的斗争实践，以及他力求达至的政治目标。这一切恰如奈格里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会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列宁和毛泽东手头上有《大纲》，就好像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他们将会对《大纲》做些什么？我能确定的是，他们将会为了他们的实践而用他们很高的品位从《大纲》中提取特别的养料，就像蜜蜂采蜜一样。这就是我所钟爱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路径。”^①

[责任编辑 孙海燕]

^① [意] 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第39页。